

“五议一创”警民共建平安社区

“诸暨义警”为公安添左膀右臂

诸暨：“枫桥经验”孵化警民互动新模式

本报记者李坤晟

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直是诸暨的“传家宝”。

近年来,诸暨公安机关通过建立“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孵化发展“诸暨义警”组织,以及“五议一创”平安议事的警民互动模式,践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零距离服务群众

2018年春节后的第一周,枫桥派出所东警务站站长赵纲的微信工作室收到了一条微信:“村里邻居打了该怎么处理?老母亲被人用铁钳打破了头。求教。”

赵纲立马与发信人张先生联系。通过交流,赵纲得知张先生节后回广东经商,家里的母亲打电话向他哭诉,他给社区民警发了这个微信。

赵纲与村干部一起到张母家里了解情况。原来,为了养鸡一事张母与邻居发生纠纷,双方都动了手,但都没有多大伤势。鉴于邻居过错大于张母,赵纲提议邻居给张母当面道歉。邻居一开始并不愿意,赵纲苦口婆心地与他讲道理。

最后,邻居被赵纲的真诚打动,主动上门到张母家道歉,还带了自己种的蔬菜,双方握手言和。当晚,张先生从广东发来感谢的微信。

“矛盾发生了,第一时间应直面矛盾,然后走进矛盾,化解矛盾。这是我们的枫桥精神。”赵纲说。

2018年以来,诸暨市公安局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深入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健全完善“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基层治理模式。市局要求社

区民警每周至少下警务区3天,每周必须走访20户以上,今年以来,已累计走访群众19266户,累计通过走访帮助解决问题2500余个。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真是第一次看到你们这些公务员天天往老百姓家里跑的。”这是枫桥派出所副所长孙法均下村走访时,村民李大娘对他说的话。

在群众中寻找方法

“民警同志,我们自然村有个路口没有视频摄像头,能不能来安装一下?”今年1月,枫桥镇乐山村石缺口自然村村民金大爷对社区民警许孝说。

当时,许孝正在村里发起“五议一创”平安议事活动,金大爷说,这个路口是自然村的主要出入口,车流量较多,近期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只要安装视频摄像头,就能避免大量纠纷。许孝实地踏勘后发现情况属实,很快,视频摄像头就安装到位了。

诸暨市公安局在全市推广的“五议一创”平安议事活动,即民警与群众一起,议安全防范、议矛盾调处、议案件办理、议普法宣传、议警务工作,共同创建平安社区。

“这不是灌输式的警民恳谈”,而是让群众说希望我们做什么,让群众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枫桥派出所教导员吴嘉军说,“五议一创”得到群众积极响应,群众提出的议题,虽然都是些工作生活中的小要求,但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打下群众基础,在后来的公安工作中,发挥出积极效应。

组建群众自治“生力军”

今天6月底的一天,诸暨市陶朱街道工业新城派出所办案大厅里来了一名妇女,哭哭啼啼、情

绪激动,声称“儿子要自杀”,民警俞伟民立刻拉上正好在场的“新城义警”协会理事长朱永建,赶去现场看看。

两人来到现场,男孩的父亲和叔叔怕孩子冲动正堵着窗口。民警连忙上前,苦口婆心劝慰。

朱永建上前拍拍男孩的背:“我是志愿者,我谁也不帮衬,就想听听你心里怎么想的。”

原来,男孩参与网络赌博,向朋友借了钱还不上。了解情况后,朱永建不断撮合,男孩签下了不再参与网络赌博的保证书,由家人替他先偿还债务,一家人和气平息。

今年3月,工业新城派出所整合了当地几个志愿者团队成立“新城义警”,成为诸暨市18个派出所的“义警”组织之一。热心公益的朱永建出任“新城义警协会”的理事长。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有了自我实现、反哺社会的需求,我们就思考,怎么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治安综合治理?”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兼枫桥派出所所长杨叶峰说。

早在2017年,枫桥派出所成立了诸暨市首个“义警”组织——“红枫义警”,组织的成员都是枫桥镇沿街店铺热心公益的店主们,不拿一分钱报酬。

“诸暨义警”平台包括内部管理、交流互动、协助公安等模块。每天,“诸暨义警”的后台管理员都会更新每个派出所当天需要义警协助的工作,每位义警点击了解后报名即可参加。

今年3月,诸暨市人民医院发生的一起电瓶车失窃案件,办案民警通过平台发布了协查通告,得益于“新城义警”提供的线索,成功抓获了盗窃嫌疑人。

警力有限,民力无限。“诸暨义警”成为公安

机关的“千里眼”“顺风耳”。

“公安力量的左膀右臂”

“我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点开微信小程序‘诸暨义警’,去找活动,看看派出所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情况。”枫桥镇枫源村村民陈慧娟是“诸暨义警”的一员,参与义警工作她乐在其中。

“诸暨义警”大大提高了公安工作的效率。“就拿流动人口管理来说,原来我们需要2位专职协警来管,如今,红枫义警的队员们以自己的住处为核心,各自管理周边的15户流动人口家庭。他们端着自己的饭碗,就能帮我们把核查工作做好,还能顺带帮我们做法治宣传、风险排查、矛盾调解等,我们的警力就可以投入到更重要的更紧迫的工作上去了。”枫桥派出所教导员吴嘉军说。

2018年,诸暨市义警总会成立。目前,诸暨有11000余名义警。

“这上万人就是社会基层治理的基石,成为公安力量的左膀右臂,极大提高了新时代警务工作效率,也符合信息化时代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潮流。”诸暨市公安局副局长蒋其单说。

对此,诸暨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潘海波说:“2019年上半年,诸暨市命案、两抢一盗案件同比分别下降33.3%、31.1%,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36%。这说明,诸暨义警组织与‘五议一创’机制,通过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

(参与采写:杜萌颖、王益均)

他们捎来跨越5000多年的来信



王祺程:想把我的热爱唱给你听

“你在太湖的波光里,灿烂辉煌。我在良渚古城上,举目仰望。曾经莫角山上建殿宇,瑶山祭天地。沧海桑田,仿佛那一场梦。”这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王祺程根据严文明先生的《良渚颂》改编而成的歌词,弹着吉他坐在遗址旁边,他对良渚文化的热爱唱了出来。

从大学期间在博物馆做讲解志愿者服务了1000个小时,到毕业后成为一名专职讲解员,王祺程说每次讲解他都依然心潮澎湃。

基于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有不少解释说明都晦涩难懂,王祺程一直在琢磨如何做好“翻译员”,把枯燥专业的文字“翻译”成大众感兴趣、便于理解的表达,“让历史也流行起来,充满味道。”

刘斌:考古人的辛苦与幸福

1985年,作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当时分配到最南边的毕业生,原籍陕西的刘斌来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下前,后来担任了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系主任张忠培叮嘱说:“长江下游是个独立区域,文化面貌单纯,是做考古的好地方。”

参加工作后,刘斌的第一个任务是跟随前辈学者王明达发掘绍兴马鞍山遗址,这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第二个任务是跟随另一位前辈牟永抗,为1986年的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学术会议整理资料。从那时起,他与良渚结缘已有34年。

考古人的工作总是在环境变化莫测的户外,与泥土、石头打交道,但当刘斌回忆起1986年初夏的一个雷雨夜时,依然久久不能平静——第一次良渚玉琮在这个夜晚出现。

“因为玉琮是良渚文化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它表示我们已经真正挖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刘斌说,大雨来临,他们赶紧把墓坑用薄膜盖好,冒着瓢泼大雨跑回住处,这一晚,大家炒了几个菜,喝了好几瓶酒,兴奋地谈论着这一天的发现,这是属于考古人独有的幸福。

7月6日,刘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现场,见证了良渚古城遗产申遗成功,他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有太多波澜或者激动。宠辱不惊、淡定如斯的考古人,只在日记中写下了内心的感慨:“古老的巴库,今天我们因良渚而结缘,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沉睡五千年再次醒来,来到巴库,走向世界。”

“几位考古人的工作,让世人重新看到了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刘斌说,考古工作的魅力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然后求证问题,从而不断追溯人类文明的源头。

(记者黄筱、冯源)

新华社杭州7月7日电

良渚古城遗产申遗成功,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玉器、陶器、古城、水坝……良渚古城遗址的宝贵印记,如同一封跨越5000多年的来信。有这样一些人,是他们,把这些来信捎给世人,让世人了解、感知到良渚文化的脉动。

康宏果:一个电话“救”了千年墓葬群

“不要动,你们不要挖了,这个是国家保护的东西,大家都不能动!”2006年4月,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港南村村民康宏果家的新宅开建,结果挖土机一铲下去,出现了几块圆盘,小时候在良渚考古作业现场做过帮工的他,觉得这可能不是一般的石头,立刻叫停了施工,第一时间和村民保护现场、并电话通知文保员。

在等待考古专家到来的两天里,康宏果心中的弦一直绷着,生怕有不法分子进来把这些“宝贝”偷走,他就在工地边上守了两天两夜。

经过3个月的抢救性挖掘,在康宏果家及附近600多平方米的地底,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九座墓葬,此外还发掘了玉器和陶器。其中玉器共200多件,最大的一块玉璧直径近30厘米。

“如果穿越到那个古王国,我们家也算是生活在皇城根下。”康宏果说,自己一家都与良渚古城、良渚文化有着不解之缘,父亲参加了多次文物保护工作,没想到在自家宅基地上发现了这么多文物。

现在康宏果是港南村村委会主任,为了更好地保护良渚古城遗址,港南村等附近村镇原则上不再进行大规模建设,村民们为此做出了发展上的牺牲。“良渚文化看起来很遥远,很伟大,但对于良渚的原住民而言,良渚文化就在身边。”康宏果说,每每坐在家中,他总能感受到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所以,在我心中保护和传承是我的职责。”

(上接1版)从晨曦初上到太阳落山,马立辉一家家地走,一户户地帮他们解决难题,乡亲们把他看作了亲人。马立辉说:“贫困户有大事小情都爱找我,这是一种亲人般信任。”

如今,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入股分红,刘秋口村92个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村里还要完成最后7个贫困户脱贫,我要继续坚守,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马立辉说。

在新河,76个扶贫工作队仍奋战在脱贫一线,通过“网格化区块式”管理,新河将扶贫工作队分为6个片区,把扶贫成效与年度考核挂钩,形成了驻村干部争着干、抢着干、比着干的浓厚氛围,打造出一支支“不走的工作队”。

探索、实践,奋进,鏖战……新河交上了一份令人刮目相看的脱贫攻坚答卷——

贫困村全部出列,累计脱贫3950人,全县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0.73%,2018年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县长李宏欣说:“集聚各方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新河脱贫攻坚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

尽显担当的引领之路

脱贫攻坚战场上,每一个农村党组织都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开路先锋。

“脱贫的主体是农民,扶贫的主体是干部,赢得这场战役,必须用最能干事的人干最难的事。”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华锐说。

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新河靠什么?

尽遣精锐,打造能征善战的队伍——

走进新河镇六户村,眼前一条笔直的柏油路

于是,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创作了歌词,和流行歌曲的曲调结合,把良渚文化里的一个个未解之谜、珍贵文物、价值意义都融合进去,歌曲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大量网民点赞。“希望更多的老百姓听到这首能够对良渚文化产生兴趣,并且主动走进来,到博物馆、遗址公园亲自感受。”王祺程说。

在他看来,博物馆讲解员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工作,肩负着文化传播传承的重任,讲好良渚故事,也就是讲好了中华民族的故事。“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会有更多国内外的游客来这里,我希望有更多人通过我的讲解,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兴趣。”

刘斌:考古人的辛苦与幸福

1985年,作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劲、有办法的一批年轻党员走马上任。

能人回乡,发挥致富带头人作用——

申家庄村曾是县里有名的乱摊子村,班子力量弱,村民脱贫也没有积极性。在外打拼多年回乡的史凤水当选村支书后,迅速把全村53名党员组织起来,一度涣散的党组织步入正轨。

申家庄村有个规矩,凡是村里开会,必须点名签到。史凤水说:“这不是为了装样子、搞形式,脱贫攻坚考验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要让大家意识到责任。”

曾经软弱涣散的党组织,如今是全速前进的“火车头”。

史凤水组织党员带头成立合作社种植葡萄。一名党员的力量可以带动几户甚至十几户村民,合作社如滚雪球般日益壮大,如今种植面积已达上千亩,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

过去,许多新河人为了生活和梦想,纷纷走出农村。现在,一批批能人陆续回乡投身脱贫攻坚,其中不乏共产党员。他们带回了开阔视野和创新思维,也带回了丰富资源和强大能量,成为反贫困战场的一支生力军。

创新模式,坚持抓好党建促脱贫——

在刘秋口村,每个香菇种植大棚前最显著的标志是党员责任岗的牌子。村支书郝丽文告诉记者,村里提出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促进党建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

党员责任岗并非空架子。“按照支部明确的1+2+N模式,一名党员要带动两名入党积极分子,然后再带动更多村民,大家一起学技术,跑市场,

奔小康。”刘秋口村党员刘洪涛说。

有33年基层工作经历的县委副书记王建中说:“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又一次大规模走进群众的难得契机,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是共产党员的初心。

自强不息的奋斗之路

荆庄乡,红军将领董振堂的故里。在他的老宅里,“克己助人、爱国持家”的祖训被高高挂起。

董振堂纪念馆、振堂路、振堂公园、振堂中学……在新河,董振堂的影响无处不在。传承红色基因,造就了新河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秉性。

在新河,每个贫困的角落都活跃着自强不息的身影。

循着缝纫机的嗒嗒声,记者来到这个乡王府村贫困户苏海辉家。不大的院子,三间老房,被51岁的苏海辉收拾得整整齐齐。

苏海辉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只能蹲着用手撑着脚慢慢挪动。村里给他办了五保户,苏海辉本可以靠政策兜底脱贫。

但苏海辉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扶贫干部每次问他有什么需要,他都说:“这双手好用着哩,想再干点啥。”

扶贫工作队帮他联系去乡里学了配钥匙的技术,苏海辉触类旁通,又自学了修鞋和修拉链。每到本村和周边村子赶集的日子,苏海辉都